



是非爱憎要分明

—和青年同志谈阶级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是非爱憎要分明

——和青年同志谈阶级分析

周羽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是非爱憎要分明

——和青年同志谈阶级分析

周羽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46,000

1971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8171·283 定价: 0.18元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目 录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1
在新生事物面前·····	12
从“好学生”的标准谈起·····	2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	29
“友情为重”辨·····	41
苦与乐浅析·····	48
舆论、压力及其他·····	57
姓孔的不是一家人·····	66
怎样正确对待家庭出身·····	76
努力学会阶级分析·····	85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对同一件事情，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拍手，有的人摇头；有的人认为“好得很”，有的人却说“糟得很”。这种现象，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也是毫不足怪的。这就叫做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电影《艳阳天》里有这样一个场面：麦收之前，东山坞农业社围绕着预分方案发生了一场争论。高级社该不该土地分红？两种态度形成了两个营垒。你听，一队队长马连福气冲冲地高吼：“今年丰收了，就该按土地分红！”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却坚定沉着地说：“高级社就是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让全体社员共同富裕！”“土地分红带有剥削的性质，就得改造它！”双方阵线分明。在马连福背后，有“弯弯绕”这样一些闹土地分红的富裕中农，还有那个暗中煽风点火、出谋划策的马之悦；站在萧长春一边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

贫下中农。

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不同的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要正确认识这场争论的性质和意义，剖析不同的人持有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必须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分析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认清其中所包含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本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

就说东山坞农业社关于土地分红的这场争论吧。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总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来观察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主张土地分红，代表了富裕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利益和愿望。土地改革以后，“弯弯绕”这号人，在农村中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农具，生活比较富裕，这些人身上表

现出来的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十分严重，他们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最会打小算盘，私有观念极重。加入农业社，他们则往往是犹豫的，勉强的，一有机会，就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他们闹土地分红，就是打算利用土地私有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剥削贫下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相反，广大贫下中农反对高级社实行土地分红，则反映了他们要求彻底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愿望。可见，主张土地分红，还是反对土地分红，都是由各自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社会上存在各个不同的阶级，各个阶级内部又分成若干不同的阶层和集团，他们处于各不相同的社会地位，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敌对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憎，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思想。鲁迅说得好：“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其实，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一个人平时的说话、办事，不论自己意识与否，都是受一定阶级的立场、世界观支配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阶级社会中一种必然现

象。

然而，贫农出身的马连福为什么也嚷着要土地分红，而一手制造了这场风波的马之悦，却装模作样地在那里表示反对土地分红，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说明呢？要说明这一点，仍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事件，活动着各色各样的人物，而所有这些事件和人物又经常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表面上看，社会生活似乎扑朔迷离，纷繁杂乱，其中还有许多假象，更易使人迷惑。但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用阶级斗争理论这条线索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土地分红，对马连福及其家庭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可是，由于他觉悟不高，私字迷住了心窍，受了马之悦的拉拢、腐蚀和挑动，被阶级敌人当了枪使。他口口声声替群众说话，其实，当他高嚷着要土地分红的时候，已经背弃了自己的贫下中农立场。立场错了，他的言论行动就背离了广大贫下中农，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言人。

用阶级斗争理论这条线索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之悦煽动闹土地分红，则是出于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这个混进党内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

于蓬勃发展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昂热情，怀有深刻的仇恨和强烈的恐惧。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不得不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他要挑动富裕中农闹土地分红，以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另一方面，他又要制造假象，装出一副反对土地分红的面孔，以便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进行破坏和捣乱。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进行阶级分析的客观依据。大家知道，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分裂为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有地主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在彼此的矛盾和斗争中存在着。恩格斯曾经说过：“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亭台楼阁，他们贪得无厌地吮吸着工人农民身上的血汗，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筑起剥削阶级的“天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阶级社会里，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

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阶级对立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千百年来，正是无数次奴隶的起义，农民的造反，无产阶级的革命，推动着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党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千方百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求我们时刻牢记阶级斗争，努力学会阶级分析，做一名立场坚定、目光敏锐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而自觉战斗。

分析好，大有益。学会阶级分析，对我们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革命青年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学会阶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识妖风，拒毒雾，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明辨方向，奋勇前进。在社会主义时期，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了，经济上被剥夺了，但他们常常利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某些优势，利用旧的剥削阶级的习惯和偏见，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钻进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是从剥削阶级的思想垃圾中，寻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们常常散布各种貌似公允的、超阶级的谎言，以掩盖其反革命的真面目，腐蚀并毒害广大群众，作为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重要手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是阶级敌人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但当时确有不少青年受了迷惑。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同志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剖析这幅对联的反动实质。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阶级关系。但这幅对联却把父子的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混为一谈，贩卖唯

心主义的天命论、宿命论，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它的反动统治，制造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来欺骗和麻痹劳动群众，他们说，皇帝、诸侯、豪门望族的子女，不是龙，便是凤，是理应骑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上等人，而劳动人民的子女则只能是低贱的，受人摆布的下等人，这些都是天意决定的，不可违拗的。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目的就是要劳动人民安于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不要起来造反和斗争。这幅对联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冒充革命口号，招摇过市，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制造思想混乱，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这就是这幅对联的反动实质所在！

列宁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时一些青年在反动血统论面前受骗上当，情况不正是如此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揭穿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谎言和诡辩的照妖镜，学会运用这个武器，就能够使我们心明眼亮，大风大浪不迷航，花言巧语不上当，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学会阶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分清敌友，明辨是非，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怎样才能分清敌友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社会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常常交织在一起，就是说，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和人民内部犯思想错误的，时常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艳阳天》中闹土地分红的人，有私有观念极重的富裕中农，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有犯错误的阶级兄弟。这三种人，既一样又不一样。你看，他们明里暗里都在闹土地分红，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言论行动是“一样”的。然而，这三种人闹土地分红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不一样”的。“弯弯绕”闹土地分红，是私有观念在作祟；马之悦闹土地分红，是阴谋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马连福闹土地分红，主要是上当受骗，被阶级敌人当枪使。萧长春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既看到“一样”，更看到“不一样”。这些人闹土地分红，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坚决顶住，决不妥协；而对闹土

地分红的不同的人，又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澄清了是非，分明了营垒，团结了同志，孤立了敌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巨大威力。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学会阶级分析，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使对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同样需要作阶级分析，以分清是非，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团结广大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学会阶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研究历史，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在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决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就无法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就会堕入一大堆史料的迷雾中，抓不住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甚至会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例如，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都诋毁秦始皇是一个“暴君”，攻击他实行“暴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恶毒咒骂秦始皇。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这一历史人物，就可以看到，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转变时期，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顺应历史的潮流，实行法家路线，统一了中国，首次

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镇压了一批妄图复辟的反动儒生。这个时期，秦始皇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暴力，在对付奴隶主复辟阴谋这一点上讲，是革命的，进步的，是当时阶级斗争所必需的。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和批判林彪一伙咒骂秦始皇，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以上我们简单地说明了学会阶级分析的重要性，现在，就让我们来具体分析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吧。

在新生事物面前

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犹如烂漫的山花开遍祖国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迎来了理论战线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春天；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红色的种子撒遍祖国的边疆和农村；一大批经过斗争风浪锻炼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推上了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走五七道路，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五七干校办得生气盎然；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革命文艺不断创新和繁荣；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可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当它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它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人对它赞扬、扶植，有人对它怀疑、歧视，有人对它诅咒、扼杀。概括起来，一种认为它“好得很”，一种认为它“糟得很”。

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潮流所至，遍及祖国城乡的各个角落，每个革命青年，革命家长，以至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都要对这一新生事物表明自己的态度。

几年来，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革命道路越走越宽广。你看，井冈山上，延安塔下，青年们昂首挺胸，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向着光辉灿烂的目标迈进。戈壁滩、北大荒、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青年们用劳动和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迎来了丰收的粮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青年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豪情满怀。一代新型农民在茁壮成长。一位战斗在湖南省株州地区农林茶场的女知识青年，写了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坚持乡村的革命激情：

沾一身清香的泥巴，
开两手光荣的茧花，
脸上闪着广阔天地的朝晖晚霞，
妈妈，你就看个够吧，
还象不象你那个小娇丫？

真是劳动出诗篇！如果不到贫下中农中间，不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没有思想感情上的变化，无论怎样地搜肠刮肚，也万万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看到青年们在农村茁壮成长，一切革命的人们，那一个不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呢！

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创举，生动地说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们的年青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一代，大有作为的一代。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创造者、促进派，当然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好得很”派。

支持新生事物，是一切革命阶级的政治特征。社会的发展，总是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战胜旧事物。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必然会涌现出

一大批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革命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也宣告了新世界的诞生，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一切革命阶级总是把支持新生事物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革命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它目光最远大，最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进事物的转化，用新生事物代替腐朽事物，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完成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就是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说，读了书理应做官，不能为民，更不能当农民，在他们看来，务农是卑贱的。“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剥削阶级观念，在社会上流毒极广。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所以，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以及读了书“高人一等”这些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千

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创举，猛烈地冲击着旧的传统观念，踏碎了林彪一伙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青年引入歧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广大知识青年通过农村锻炼，既懂阶级斗争，又懂生产斗争，能文能武，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正在成长。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对于这样一个革命的新生事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热忱欢迎和支持，热情称颂革命的新生事物好得很！

革命的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比较幼小的，不成熟的，但是它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伟大的革命导师以他们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总是最善于发现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列宁支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故事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形势十分严重，社会主义事业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为了

社会主义的胜利，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主动倡议每天把工作日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星期六进行六小时不计报酬的额外劳动，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晚上六点钟，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二百多名工人象战士一样又来到了集合地点，开始了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修理机车，装卸货物，劳动十分繁重，劳动生产率却比平时高几倍。当喀山铁路工人高唱着《国际歌》结束义务劳动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放射出胜利的自豪的光芒。这个消息在报纸上一发表，列宁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立即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列宁高度赞扬工人的首创精神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肯定这种不计报酬的忘我的义务劳动是“活生生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创举”。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有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农业合作社发生了分化：三户老中农退出了合作社，搞单干去了；而三户贫农则坚决要求继续干下去，坚持办社。毛主席热烈赞扬这三户贫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历史的发展

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都亲自培育和扶植了一大批革命的新生事物，为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广大群众不断争取新的胜利。

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有人称颂它“好得很”，必定也有人说它“糟得很”。

害怕革命的新生事物，吹嘘腐朽的旧事物，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阶级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人，都是“糟得很”派。

林彪恶毒地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个钻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凭着他反革命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将从许多方面有力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摧毁他们藏身立命的基础，这怎能不引起他们切肤之恨呢！所以，他们总是带着反动剥削阶级的阴暗心理，对上山下乡这一代表共产主义幼芽的新生事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一切妄图搞复辟倒退的阶级敌人总是十分孤立的，他们时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咒骂新生事物，用“变相劳改”等恶毒语言

来动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心，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而又装出一副“关心青年”的脸谱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林彪胡说什么“解脱体(力)劳(动)”，“才能想问题”，就是妄图把青年往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道路上引。值得注意的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在反对新生事物的时候，有时还采取十分隐蔽和狡猾的方式，把腐朽的旧事物贴上新的革命的标记，冒充革命的新事物，招摇撞骗，欺世惑众。对此，我们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擦亮眼睛，谨防假冒，戳穿阶级敌人反对革命新生事物的一切卑劣伎俩。

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人民内部，包括一部分青年中间，也会有一些错误态度。例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的人态度暧昧，消极观望；有的人害怕艰苦，留恋城市，制造种种理由不想去农村；也有的还发表一些错误的议论。这些同志，与阶级敌人对新生事物的恶意攻击，性质是不同的。然而，这种错误态度和思想，客观上迎合阶级敌人反对新生事物的需要，是“学而优则仕”、“耕馁学禄”之类剥削阶级观念的表现和反映。因此，如果不抓紧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不同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不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决裂，就会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生抵触，甚至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扰，可能会使新生事物受到某些挫折，而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不到新生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看到新生事物的某些弱点和不足之处，或被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的某些困难和曲折所动摇，也会对新生事物采取错误的态度。可见，支持新生事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不仅要求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要求我们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革命阶级战胜反动阶级，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我们伟大祖国百花争艳的社会主义春天，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为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大喊大叫，同一切腐朽的社会势力和思想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列宁说得好：“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让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我们一起，健康地、茁壮地成长吧！

从“好学生”的标准谈起

正当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开展的时候，看了彩色故事影片《决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怎样看待学生的好坏？是这场大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影片以生动的形象揭示出：怎样才算一个好学生？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的人，有着不同的尺子，不同的标准。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李金凤，这个在旧社会苦水里泡大，对党对毛主席怀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入学以后，她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为革命上大学，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革命勤奋学习，敢于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她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冲破旧教育制度的束缚，带领同学到生产队扑灭了严重的虫害；在开门办学中，又在农村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善于识别香花和毒草，顶住了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妖风。这样的学生，无产阶级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认为是“好学生”。可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的副校长曹仲和等人，却把她斥之为“坏学生”，对她横加迫害，又是“勒令退学”，又给她扣上“反党”的帽子，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必欲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

李金凤的事例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衡量学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罪状”。无产阶级看学生，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即使是业务学习，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在曹仲和等人看来，只有那些死啃书本、“门门五分”、温良驯服、对这伙资产阶级老爷“听话”和“唯命是从”的学生，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好学生”。

在无产阶级看来，评价一个学生，首先要看他的政治觉悟，看他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现实表现。毛主席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上时刻牢记阶级斗争，立场坚定斗志旺，心明眼亮永向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时刻想到为中国和世界大

多数人谋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为革命勤奋学习，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做到又红又专。相反，一个青年，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态度暧昧，立场动摇，经不起风浪，认不清道路，容易上当受骗。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革命青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此了。

当然，我们说评价一个学生，首先要看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表现，并不是说学生不必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好学生的标准，就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在德育的统帅下，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有用知识和本领，还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使学生成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新一代。李金凤就是无数个这样的优秀工农兵学员中的一个代表。她觉悟高，立场稳，无论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文化低难不倒，在风雪严寒的简陋教室内，在老师和同

学的帮助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为了改变家乡的山山水水,她不但培育出了优良的稻种,而且在实验室内聚精会神地研究改良红土壤;她能够运用学校中学到的水稻病虫害的知识帮助生产队检查虫情,防治虫害。十分清楚,李金凤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决不是旧学校那种“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单纯的书本知识,而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会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本领和能力,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教育质量。

曹仲和等人把李金凤斥之为“坏学生”,勒令她退学,凭的是什么理由?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是因为李金凤“考试交了白卷”。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突然袭击,用考试、分数来迫害工农子弟。李金凤他们抵制了它,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交了“白卷”能说明什么?在曹仲和等人看来,李金凤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所以是“坏学生”。而在无产阶级看来,李金凤是好学生,因为从这些“白卷”里,可以看出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里有同学们的汗水和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贫下中农老代表说得好:你们说他们交了“白卷”,我们说他们交了“红卷”。

当然,在曹仲和等人眼里,也有他们所赏识的“好

学生”，就是那个富裕中农的儿子余发根。这个学生，上大学是为了离开农村，升官发财；进了学校后，又驯服地接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熏陶，对老师温良恭顺，又是“门门五分”。可是，就是这个余发根，刚学到一点技术，就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牟私利；家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也在“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妖风影响下，退了学。

李金凤和余发根，这两个学生，究竟谁个好？谁个不好？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标准。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竭力诱骗青年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忘记阶级斗争，不关心国家大事，闭门读书，他们向青年宣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妄图把广大青年束缚在课堂上和书本中，一心追求个人的名利和“前途”，成为他们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由于中了修正主义的毒，书越读越多，头脑中的“私”字也就越来越膨胀，甚至把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置于脑后，把学到的知识、技术当作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竟然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多么严重

的教训：

可见，那种不看方向，不看路线，单纯以“门门五分”来要求学生，衡量学生，不是无产阶级的标准，而是资产阶级的标准，是修正主义“智育第一”的标准。

对“听话”，我们也要作阶级分析。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一个人说的话，总是反映一定的阶级立场，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听谁的话，就意味着接受哪个阶级的教育，按照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图去办事。因此，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提倡“听话”或“不听话”，都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你听谁的话，听哪个阶级的话。鲁迅说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是非爱憎何等分明！毫无疑问，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听毛主席的话，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决不能听阶级敌人的话。对于教师、家长和领导的话，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然要听；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不能听，而且要加以抵制。

要求学生盲目“听话”，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好学生”的一条重要标准。影片中的徐牛崽，面对着课堂上脱离实际的、没完没了的讲什么“马尾巴的功能”，向教师提意见，要求按照当地的特点，“少讲马，多讲猪和

牛”，竟遭到无理的挑剔和压制，甚至被赶出课堂。而李金凤因为顶了工作组贯彻的“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妖风，竟被加上“反党”的罪名。然而，李金凤堵了资本主义的路，正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可见，“听话”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要坚持教育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决不能听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话。

历史上一切反动剥削阶级总是笼统地提倡所谓“听话”，其实，他们提倡的“听话”，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他们只允许人们盲目地听从上帝的话，“圣人”的话，朝廷官府的话，父母师长的话，不许有丝毫违抗。而对于反对他们的话，对革命的道理，则视为洪水猛兽，诬为妖言邪说，禁止人们去听。封建地主阶级要培养青年成为对封建王朝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安分守己的奴才；资产阶级则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的“有用的奴仆”。他们都把“听话”当作向人们灌输反动思想的手段，当作禁锢青年头脑的戒律。可见，剥削阶级以及党内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提倡这种“听话”的实质，就是不许人们“犯上作乱”，驯顺地接受他们的反动统治，以便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实现其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对此，我们革命青年必须提高警惕。

要求我们时代的青年不问路线是非，盲目“听话”，做百依百顺的驯服工具，归根到底，是培植奴隶主义，从思想上磨灭革命青年的锐气和棱角。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青年，要求青年，只能使青年成为温良恭俭让的“老好人”。这样的青年，害怕矛盾，害怕斗争，害怕困难，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和斗争；这样的青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容易上当受骗，为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分子所利用；这样的青年，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说李金凤是我们时代的好学生，好就好在她能够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前进；好就好在她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和传统观念进行斗争和决裂，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我们时代的“好学生”、“好青年”，就应当是那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充满革命朝气，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革命小闯将。

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老人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革命的青年们，努力啊！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

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我们革命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父母爱？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健康地成长，是很有关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父母爱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反映一定的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也不会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父母爱。

剥削阶级总喜欢谈论抽象的“骨肉之情”、“天伦之乐”，把父母爱归结为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的人性，抹杀父母爱的阶级性，这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谎言。事实上，不同的时代，不同阶级的父母，他们爱子女的目的、内容、标准和方式，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对父母爱必须坚持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大家知道，在私有制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

济单位，子女历来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父母对子女的爱，无不打上私有观念的烙印。

封建地主阶级父母对子女的爱，集中表现在这样一句话，叫做“望子成龙”。所谓“成龙”，就是要子女出人头地，做官当老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封建社会里，要“成龙”，就要教子尊孔读经，把孔孟之道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把孔孟之道的灌输同功名利禄的诱饵结合起来，提倡一条从熟读孔孟圣贤书到“学而优则仕”的“成龙”道路。在剥削阶级看来，让子女走这条道路，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青年人对这条道路表示某种怀疑和反抗，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就会遭到指责甚至打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因为他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受到他父亲贾政的无情鞭笞，差一点送了这个“不肖之子”的性命。可见，剥削阶级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归根结底，是希望子女能得到高官厚禄，继承和扩展他们剥削得来的田产和钱财。这就是“望子成龙”这种父母爱的阶级实质。

在现代资产阶级家庭里，父母子女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关系一样，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把“父母爱”、“骨肉情”这些东西，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红与黑》中，

描写了这样一件事：主人公于连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他的父亲去探监，对他十分冷淡，百般责怪，这时，于连忽然喊出了一句话：“我存得有钱”。这句话象魔术般地使老头立即和颜悦色，并迅速改变了于连的地位，对此，于连感叹地说：“这就是父爱！”

当然，地主资产阶级的父母爱，还表现在对子女百般娇养和无节制的宠爱。那些饱食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的老爷太太，常常把子女作为消闲解闷的“玩物”，同他们一起过着不劳而获而又极端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使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长大成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社会寄生虫。十分清楚，这种建立在吮吸劳动人民血汗基础之上的“父母之爱”、“骨肉之情”，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阶级烙印。

“养儿防老”这句话，则反映了小私有者、小生产者对子女的要求和希望。在旧社会，小农及小手工业者，他们终日辛劳，饱经忧患，备受地主资本家无情的剥削和压迫，随时都面临着破产的境地。个体经济的地位，又使他们无法改变社会的现实，他们只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旦年老多病，丧失劳动力，更会遇到无穷的灾难。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守住这份家产，使自己过一个比较宁静的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养儿防老”所反映的小私有者对子女的爱，只是为了消极地

维持其小私有者家庭的现状，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无产阶级的父母爱，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父母爱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一无所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他们的子女被迫从年幼时就开始到工厂去做童工，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苦难的生活严重地摧残着无产者下一代的身心健康，这决不是无产者不爱自己的子女，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迫使无产者家庭遭到破坏，使他们的子女“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产者的家庭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天伦之乐”呢！

当然，无产阶级在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武装以前，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因而他们在家庭中对子女的爱，还只能停留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和朴素的感情上。无产阶级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懂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以后，无产阶级家庭中的父母爱才会上升为阶级爱，把爱子女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高尔基的著名小说《母亲》，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中的母亲，怎样从一个普通妇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

的坚强战士。起初，她发觉儿子放工回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被沙皇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她开始为儿子的命运担忧，甚至暗暗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可是，在儿子和他战友的影响下，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母亲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后来，当儿子被捕入狱以后，母亲并没有被吓倒，相反，她毅然走上了儿子所走的革命道路，直接加入了战斗的行列。革命的实践使母亲的精神境界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她从对自己儿子的爱，上升为对所有革命战士的爱，上升为对所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的爱。这里，我们看到，工人家庭中的父母爱，只有同阶级的革命的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所提倡的父母爱。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李玉和对铁梅的爱，同样体现了这种无产阶级的父母爱。

应该看到，父母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去影响和改造子女。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观念，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散布的大量封、资、修思想毒素，一定会在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上反映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重要的是，我们革命青年，要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学会阶级分析，正确对待父母爱。这里，我们想和青年朋友们着重讨论

以下几个问题。

子女应当怎样接受父母的教育？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教育，包括家庭教育，都是有阶级内容的。因此，对于父母的话，我们要学会运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和鉴别。正确的，符合革命利益的话，我们要听；错误的，违背革命利益的话，就不能听，而且要进行必要的抵制和批评，帮助父母克服旧思想，同传统观念决裂。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父母特别关心子女的前途，也常常对子女进行前途教育。然而，怎样才算“好前途”？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有的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是“望子成牛”，依然“望子成龙”，在他们看来，子女去务农，去当炊事员、清洁工是低人一等的，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子女留在身边，找一个所谓“有出息”的工作，甚至阻挠子女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在我们的社会里，用轻视农村、轻视体力劳动这些剥削阶级的旧观念去影响子女，为子女选择前途，实际上是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子女，把子女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推。对于这样的父母爱，对于父母这样的“教育”，我们革命青年要学会鉴别和抵制。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对待父母教育的生动事例。

柴春泽的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的老干部，他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枪林弹雨的考验，又长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岗位上战斗。但是，在对待子女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他曾两次写信动员柴春泽“转点”和“进工厂”，受到儿子的抵制。柴春泽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诚恳而尖锐地向他提出批评：“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的拔根教育。”

一个要“扎根”，一个要“拔根”，这里代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柴春泽的父亲看来，让儿子“转点”或“进工厂”，也是出于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而在柴春泽看来，这样的父母爱，出发点是个人的和小家庭的利益，是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的表现，应当坚决斗争，才能彻底决裂。柴春泽要求父亲对他进行“扎根教育”，就是要父亲用无产阶级的标准爱自己的子女，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子女，让子女继承革命传统，接好无产阶级革命的班。所以，当柴春泽的父亲认识错误后，深有感触地说，对子女进行“拔根教育”，看起来也是“爱”子女，为子女的“前途”着想，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在引导子女接资产阶级的班。

子女需要父母什么样的“关心”？

父母对子女关心，是具体的多方面的，这里也常

常表现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你看过长篇小说《征途》吗？这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描写了两个上海知识青年的母亲：一个是钟卫华的母亲，是个包身工出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另一个是万莉莉的母亲，是个浑身浸透铜臭的资产阶级太太。这两个母亲，用完全不同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方式“关心”着自己的子女，反映了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码头上，钟妈妈刚做完夜班从厂里赶来送行，她送给儿子的礼物，是旧社会留下的一件印着车号、凝着碧血的号衣，一张变黄发硬的包身契和一块沾满血泪的工牌。钟妈妈对即将远征的儿女，语重心长地叮咛：“去吧，孩子，和同学们一道，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你们要冲锋在前，吃苦在先，千万不要辜负毛主席对你们青年一代的希望。”而万莉莉的母亲呢？不但给女儿装满了大袋小包的东西，临走时还贴着女儿的耳朵嘱咐：“记住，在你的手提包的夹层里，我给你藏着二百元钞票。这是给你的保险路费——回上海的路费。在那里吃不完的话，随便什么时候就回来，要记住！”

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阶级，两种关心，都是围绕着争夺青年一代展开的。广大革命家长关心自己的子女，总是首先关心子女在政治上的成长，教育子女努力

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鼓励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子女下乡以后，又勉励子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钟妈妈就是千百万个革命家长的光辉代表。但是，象万莉莉的母亲那样，他们“关心”子女，是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毒害他们的子女。他们不但把子女视为私有财产，而且千方百计地把子女培养为资产阶级家庭的继承人。面对这样的“关心”，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丧失警惕，就容易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殉葬品。万莉莉后来差点被反革命分子拉下水，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有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长，受了旧思想的影响，溺爱子女，也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去“关心”子女。他们对子女政治上进步很少过问，生活上的要求却百依百顺。子女下乡以后，今天寄副食品，明天寄新衣服，吃的、穿的、用的，想得周到齐全，这样做，只会助长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妨碍子女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我们说，父母固然需要从生活上关心子女，但更重要的，却是应当从政治上关心子女的成长，有的革命家长说得好：“不寄糖果甜嘴巴，多寄革命书籍红思想。”我们革命青年，在生活上不能依赖父母，在政治上却需要包括父母在内的社会上各方面的关心，使自己更快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子女应当接受父母怎样的“遗产”？

在旧社会，遗产就是私有财产，它是私有制社会的基础，是剥削阶级的命根子。那时，地主资本家作为遗产留给子女的那些金银财宝，工厂地产，无一不是靠劳动人民的血肉和白骨堆砌起来的。剥削阶级的子女，依靠这些不劳而获的遗产，过着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在剥削阶级看来，剥削越多，遗产越丰厚，就显得越荣耀。但是，在无产阶级看来，获得这样的遗产是十分可耻和可鄙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私有财产，谈不上有什么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没有人再将生产资料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了。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家长，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是充满着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让我们听听老红军甘祖昌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一次，甘祖昌的大儿子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晚上，他把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废除继承权”的论述，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甘祖昌这种对自己子女严格要求的马

克思主义态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对革命后代的真正爱护。

说到这里，使人想起了著名的历史故事《触龙说赵太后》，其中有一段对话，很发人深省：

触龙：三代以前，赵国建立的时候，赵王的子孙封侯的，现在还有继续世袭的吗？

太后：没有了。

触龙：不但赵国，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还有世袭的吗？

太后：没听说还有。

触龙：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扶重器多”所造成的吗？……

“对话”中所谓的“重器”，就是现在常说的“权力”、“权利”的意思。这段对话，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父母怎样对待子女，但是，

对我们时代的革命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父母爱，也是有启发的。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尤其是革命干部子女，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搞特殊化，借着父母的地位和金钱，即借着现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给自己经营一个安乐窝，而应当接过老一辈手中的红旗，接好革命的班，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友情为重”辨

“友情为重”，这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顽匪头目座山雕的一句话，也是历代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经常宣扬的一种交友之道。

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友情”？能不能抽象地讲什么“友情为重”？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交朋友，同人们相互之间结成的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总要打上各种阶级的烙印。朋友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阶级关系。人们常说好朋友之间“志同道合”，这种“志”和“道”，决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的“志”和“道”，总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两个人所以能“志同道合”，结成朋友，他们之间必定有某种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处于某种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存在某种相同的阶级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友谊的共同基础。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就谈不上建立什么真正的友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世界上

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正如猫和鼠不能结交朋友一样，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是不可能结成朋友的。

可是，剥削阶级却说，人和人之间可以不分阶级，彼此友爱，讲“友情为重”。他们提出“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超阶级的口号，贩卖抽象的“江湖义气”，来欺骗群众。林彪鼓吹的“两和皆友”，也是这一套货色。这种超阶级的交友之道，不仅是十分反动的，而且是极端虚伪的。

就说座山雕吧。

看过《智取威虎山》的人都记得：在威虎厅上，当杨子荣说到为了取得联络图，把栾平灌醉的时候，座山雕脱口而出，高嚷：“宰了他！”这时，杨子荣机智地利用土匪中的所谓“江湖义气”，沉着地说：“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座山雕顿觉失言，急忙改口说：“对，对，对，友情为重，友情为重啊！”

这个情节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座山雕讲的“友情为重”，不过是掩饰他心狠手毒的一块遮羞布，是和“宰了他”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反动剥削阶级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损人利己，贪婪自私，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就决定他们在结交朋友时，只能以利己为标

准。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就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高唱“友情为重”，沆瀣一气；而当他们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相互倾轧，以邻为壑，乃至落井下石，“宰了他”，置“朋友”于死地。为了抢夺那张秘密联络图，座山雕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尽管他口头上也会讲几句“友情为重”，可是，当他赤裸裸地主张宰栾平的时候，剥削阶级人物吹起的五光十色的“友情为重”之类的肥皂泡也就彻底破灭了。

其实，座山雕讲的“友情为重”，与有些人讲的对朋友要有“江湖义气”，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义”字作一些分析。

“义”，是一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封建社会里，所谓对朋友要讲“义”，是同对君王要“忠”，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一样，构成封建礼教的一部分，把朋友关系纳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的轨道，以便在“义”的口号下，结朋聚党，为封建王朝卖力卖命，防止“犯上作乱”，为巩固反动统治秩序服务。

但是，在历史上许多次农民起义中，也常常出现以聚众结义的形式，来动员和组织自己的革命队伍。《水浒》中梁山农民军初创期间，在晁盖领导下，“义”是

以“杀尽不平人”、“砍尽不平事”为号召的。我们看到，一方面，农民起义军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讲“义”，主要用来表示起义者团结互助的朴素愿望，成为联合五湖四海起义农民的精神纽带。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以“义”这一类封建的道德观念为号召，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容易被混入农民军队伍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所利用，用儒家的“义”加以混淆和篡改。宋江就是这样。他在晁盖死后，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字之易，篡改和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把“忠”字摆到了“义”之前，“义”成了从属于“忠君”的工具。宋江就是用这服从于“忠”的“义”，腐蚀和毒害梁山的起义队伍，使起义英雄们识不破他的叛徒内奸真面目，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面前步步退却，最后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甚至连坚决反对投降的李逵，也就是因为被“义”字蒙住了眼睛，捆住了手脚，最后成了宋江投降路线的牺牲品。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义”的虚伪性、反动性和它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性。

剥削阶级所宣扬的这种超阶级的“义”，在今天仍有流毒。比如，有的青年在交友中，也强调讲义气，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好朋友”，就可以不讲原则，不顾政策，讲交情，搞所谓“有福同享”；只要是“好朋友”，就可以见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闻不问，见缺点错误

互相包庇，甚至一起为非作歹，订攻守同盟，鼓吹为朋友两肋插刀，搞所谓“有难同当”。这种友谊，不仅低级庸俗，而且十分危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些阶级敌人正是在结交朋友的幌子下，鼓吹超阶级的“友情”、“义气”，用以腐蚀干部和群众，破坏革命团结，损害革命事业。如果被超阶级的“友情为重”迷住了眼睛，就会真假不辨，敌友不分，甚至丧失立场，“友情”变成了坏人的防空洞，做出危害革命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革命青年，一定要批判超阶级的“友情为重”，同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

无产阶级历来反对这类超阶级的口号。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有一个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它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叫做“人人皆兄弟”。一八四七年，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这个组织以后，立即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对这个同盟进行改造，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代替同盟的旧口号，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同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组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相同的遭遇，也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共同的阶级敌人，这就决定他们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成为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口号，它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一样，鼓舞着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英勇战斗。正如列宁在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时所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无产阶级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它最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不需要为个人和少数人的私利结朋交友，也从来不讲抽象的“义气”和超阶级的“友情”。

当然，无产阶级战士在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共同斗争中，也会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是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基础上建立的，在同阶级敌人激烈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影片《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和齐大同，就是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齐大同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与冯涛，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可是，当这对亲密战友，在对待建造新舰艇“海鹰”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冯涛对齐大同的错误，并不因为是好朋友

而姑息迁就，他毫不讲情面地对齐大同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帮助他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种友谊，体现了他们是革命的战友，不是资产阶级的朋友。

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而不是超阶级的“友情”和“义气”。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体现在同志之间在政治上互相勉励，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工作上互相促进，在生活互相关心。战友取得成绩，不作庸俗的吹捧，而是作为相互促进的动力；战友有缺点错误，不是袒护、包庇、纵容，而是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战友掉队了，不是疏远他，而是满腔热情地帮助他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是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因而是襟怀坦白的，真诚无私的，它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我们革命青年，应该建立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友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并肩前进。

苦与乐浅析

什么叫苦？什么是乐？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各个阶级不同的苦乐观，反映了各个阶级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这里，让我们先看看革命先烈方志敏同志的回答吧：

“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芭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敌人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诱降面前，写下的大义凛然、气势磅礴的词句，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面前，什么华筵美餐，什么丽服轻裘，什么黄金美钞，什么豪华的住所，柔软的钢

丝床，通通“不希罕”。这是因为，在旧社会，这些供地主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享用的东西，样样件件，无不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泪，“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户膏”。肩负着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憎恶一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剥削阶级那种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在无产阶级看来，是极端可耻的，可鄙的。相反，住茅棚，吃苞粟，为革命忍受各种艰难困苦，过清贫、朴素、洁白的生活，却一百个“宁愿”。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心眼里只装着两个字：“革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崇高的革命理想，使无产阶级战士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崇高的革命理想，也激励着无产阶级战士不畏艰苦，茹苦如饴。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就是建立在这种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基础之上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对待苦与乐的问题上，总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出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大寨老共产党员贾进才开山取石，抡起三十八斤重的大锤，一口气就打了一百多下，震得虎口流了血，但他不吭一声，总是干得那么乐。有一天夜里，大雪下了尺把厚，天刚

蒙亮,贾进才就来到石窝。太阳在东方露头的时候,社员们给老贾捎来了早饭。揭开砂锅一看,饭早就冻成冰渣渣了。人们要给他点把火热一热再吃,他说:“热它做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的人,没那么娇嫩。出上一身汗,让它在肚里变热去吧!”大寨人民都有这种吃苦精神,老年人是这样,青年人也是这样,他们说:“没有亮堂堂的胸怀,没有为革命吃苦的精神,怎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与此相反,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做人的诀窍也是两个字:“为我”。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苦乐观必然也是以此为转移的。他们以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乐”,以过奢侈淫佚的生活为“乐”,而当失去这一切时,就认为是“苦”了。

怎样看待苦与乐,对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来说,是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干革命就要艰苦奋斗,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如此。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办到?因此,在今天,我们敢不敢为革命不怕吃苦,敢不敢为革命自找苦吃,就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九七五年初,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上海籍战士、

年轻的共产党员魏尧升同志要复员了。按照规定，他是可以回上海安排工作的。可是，小魏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后，明确了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在复员前夕，他向党组织表决心，“打破个人小圈圈，想到整个革命事业”，坚决要求复员不回上海，到艰苦的农村去干革命。组织上批准了他的革命要求。现在，他已在革命老根据地江西永新县三湾大队安家落户了。

明明可以回到上海，偏要奔赴农村；明知农村艰苦，却要扎根农村。有人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傻了”。不，这不是“傻”，这正是我们一切革命青年所应该选择的道路。小魏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乐，不是小家庭的舒适，而是阶级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到农村去苦不苦？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当然要比城市艰苦一些，文化生活水平也要比城市低一些。但这些是由于存在着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对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缩小它、限制它，还是欣赏它、扩大它？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能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问题。小魏正是从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宁愿自己吃苦，做限制资产阶级法

权的尖兵，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资产阶级法权给他生活上带来的某些优越条件。这种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树立了无产阶级苦乐观的革命战士的宽广胸怀。小魏的这种革命行动，对那些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或小生产者传统心理的人来说，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在青年同志中，也有极少数人，在政治上要求很低，工作上马马虎虎，物质享受上却孜孜以求。他们整天在个人小圈圈里打转，讲究吃穿，追求安逸生活、美满的小家庭，认为这就是“乐”。在他看来，党的事业、人类的解放，都是他人的事情，自己没有关心的必要。他所关心的、操劳的，就是自己鼻尖底下的“小天地”。这些同志奉行的人生哲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图个“实惠”，或叫做图个“小乐胃”。

这种思想错在哪里？

我们从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个人和小家庭的生活安排得好一点，也是可以的。但那种单纯追求物质生活上安逸舒服的人，必然缺乏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无产阶级的雄心大志，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鲁迅曾经热烈赞扬“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鄙视那些“虽然革命，

而在享福的人”，他谆谆告诫人们：“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讲究“实惠”的人生哲学，追求“小乐胃”的人，从阶级根源上看，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小康思想。在旧社会，中农和一部分手工业者生活上略可温饱，要向上爬又爬不上去，便转而主张“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幻想保住自己的小康局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旧观念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缺乏革命理想，追求物质享受，满足于把个人生活搞得舒舒服服，把小家庭建成一个安乐窝，便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因此，从思想本质上讲，这种人生哲学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为它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是以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为转移的，是与大公无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完全背道而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阶级敌人，特别是林彪一类修正主义头子，总是力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用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引诱青年，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迷惑青年，林彪赤裸裸地鼓吹“诱：以官，禄，德”，对于那种不问无产阶级政治，迷恋于生活上追求“小乐胃”的人，很易于接受这种诱骗，从而不知不觉地落入修正主义者设置的陷阱，这是多么危险啊！

有的青年同志不懂得苦与乐的辩证关系，他们觉

得，艰苦奋斗，明明要吃苦，哪里有什么“乐”可言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大寨的革命青年是怎么说的吧。几年来，大寨革命青年和老一辈贫下中农一起，在建设新大寨的斗争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和流汗，他们不光听老一辈讲旧社会的苦，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自觉地去吃苦。他们说，“吃这种苦，为的是使贫下中农不再吃二遍苦，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所以，虽苦犹甜，乐在其中。”

“虽苦犹甜，乐在其中”，这句话十分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苦乐观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战士自己吃苦，为的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获得幸福；无产阶级战士今天吃苦，为的是建设美好的未来，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早日实现。困难和艰苦，哪里都有，对无产阶级战士说来，迎着困难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思想斗，其乐无穷。所以，在革命的征途上，不论斗争环境多么艰险，物质生活何等艰苦，他们的革命斗志总是旺盛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振奋的，乐观的。

你看，在斗争环境艰难的革命年代，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行军一路歌，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你听，在祖国大西南万水千山之间修筑成昆铁路的英雄们的豪言壮语：问我生活苦不苦，心中有个八亿多。为了祖国修铁路，越是艰苦越幸福。

你可知道，巡逻在风雪边疆的珍宝岛战士在想什么？他们迎着满天风雪，想的是千家炉火；脚踏着三尺冰凌，想的是万里春色；吃的是一把炒米一把雪，想的是大寨谷香翻金波；住的是一顶帐篷一个雪窝，想的是大庆油田井架座座……。

老红军战士方和明，民主革命时期跟着毛主席扛枪走天下，全国解放后，扛起锄头坚持乡村干革命，让我们听听他谈的一段体会吧：“苦中含有甜。我在农村与泥巴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可以说，天天在吃苦，也天天在尝甜。比方说吧，大前年，我们遇到历年来最大的旱灾，为了把老天斗输，我们昼夜守在水渠上，想方设法搬水抗旱。要说苦，是吃了些。但是到了秋收时节，算盘一响，粮食又超《纲要》，当我们车拉肩挑去送公粮的时候，那个心啊，不晓得有多甜！”

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只有具备无产阶级苦乐观，即共产主义苦乐观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庸人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胸怀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

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一代革命青年，应当树立无产阶级的苦乐观，要象魏尧升同志那样“打破个人的小圈圈，想到整个革命事业”，为革命自找苦吃，为革命不怕吃苦，哪里任重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作战！

舆论、压力及其他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舆论,总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因此,对于社会舆论,我们必须作阶级分析。

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报纸、电台、出版物,都应是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同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形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舆论。大字报、小评论等形式,都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有力武器。革命舆论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类社会舆论。

例如,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中,许多青

年扎根农村志不移，领导上准备选送他进工厂，他不去，群众推荐他上大学，他也不去。这时，就有人会笑话他们“放着高处不飞，尽在低处打转”，是“阿憨”、“傻瓜”。

在对待革命的分工上，也有同样的情形。上海不少青年豪情满怀地走上扫马路这个“一人脏、万人洁”的工作岗位，并表示要一辈子在南京路上清扫污泥浊水。这时，就有人说：“清洁工人名声差，低人三分没前途”。

还比如，当有的青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人又会在旁边讲什么“言多必失”啦，“出头椽子先烂”啦，等等。

这样的舆论，在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上，同样也有所反映。

不久前，我们看到一个在农村插队的女知识青年的来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底，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几年来，通过劳动，使我对农村的一草一木，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贫下中农产生了越来越亲的感情，也与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农村青年建立了爱情，当我准备和他结婚的时候，却听到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受到很大的压力。我

的姊姊来信说，你在穷山沟和一个普通农民结婚，实在不相称。有的好朋友劝我说，你和他结了婚，就一辈子别想离开这穷山沟了。我的父母说，如果我与这个农村青年结婚，就同我断绝往来。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我坚持农村，并和那样一个热爱集体，积极劳动，作风朴实的贫农青年恋爱和结婚，竟会遭到这样多的非议？甚至连我的父母、亲戚、同学、朋友都不支持我……”

每当一件新事物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种种舆论，这是不足为怪的。问题是，在这些舆论面前，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

要顶住错误舆论的压力，并不是容易的。打铁先要自身硬。要自己立场不动摇，首先要弄清楚这些错误舆论的阶级实质。

就拿上面那封信里所谈到的一些舆论来说，它明显地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特别是那种反映封建阶级等级观念的“门当户对”、“女攀高亲”的传统观念以及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的错误思想。

说起“门当户对”，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婚姻。本来，他与苏州小姐林黛玉早就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情投意合，产生了爱情。但在贾

府主子看来，林黛玉离经叛道，又从小丧尽父母，寄人篱下。从家庭地位来说，林家凋零凄凉，贾府还貌似赫赫扬扬。因此，如果承认宝、黛的爱情，不仅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叛逆思想，而且对“门当户对”的体统简直是莫大的亵渎。于是，贾府主子们根本不问贾宝玉自己的意愿，又是逼，又是骗，硬是选取了出身富贵门第、品格性情完全合乎封建伦理道德标准的“封建淑女”薛宝钗作了宝二奶奶，以图通过这一联姻来延续和重振正在败落中的贾氏家业。同样，“女攀高亲”也是封建家族依附权贵、扩大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在薛家看来，贾府门阀豪贵，贾宝玉又在贾家处于“众星捧月”般的地位，能够让宝钗登上宝二奶奶的座位，自然可以维护和扩大薛家的势力。他们千方百计地散布“金玉良缘”的舆论，目的就在于此。

《红楼梦》中的这个事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门第不一，无非分为两大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前者属于高贵的“上等人”，后者则被视为低贱的“下等人”。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样的社会中，剥削阶级当然不会让子女去与地位低下的人家去配亲，穷苦人家的子女也攀不上豪门望族。即使在封建阶级内部，也因财产和权势的不同，而分属于不同的门户。世上

只能龙凤相婚，决不能虎犬相配，为了使这种秩序永恒化，封建统治阶级就竭力把男女婚姻的“门当户对”作为一种体统固定下来，“门当户对”这类社会舆论也流传了下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在革命队伍内部，做工的，种田的，扛枪的，教书的，做医生的，当干部的，都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然而，旧的习惯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加上现今社会上还存在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样，“门当户对”这类旧的传统观念在新的条件下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一些人的眼里，生在城市的有文化的学生是高一等的，生在农村的握锄头的“阿乡”则是低一等的，双方不属于同一门户，即不属于同一等级，因而是不能谈恋爱配婚姻的。那位写信的女青年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所遇到的舆论，不正是“门当户对”这类陈腐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吗？

对错误舆论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勇往直前。在吉林省延吉县勇新公社插队的上海女知识青年郭慧，就是勇于同旧传统

观念决裂的千万个青年中的一个。郭慧来到长白山下，几年来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和生产斗争的日日夜夜，使她磨练了筋骨，锤炼了红心。她决心扎根农村，并准备和当地青年农民林昌禄结婚。这个消息一传开，人们议论纷纷，错误舆论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有人说：“你是大城市来的高中生，与一个普通的农民结婚，成啥体统？”郭慧认为，这种议论是“门当户对”、“女攀高亲”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要打破这些旧的传统观念。

有人说：“你是独生女，父母把你养大，难道你真要一辈子远离父母？”郭慧回答说，父母需要我照顾，但农村更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去建设，我扎根边疆，离父母是远了，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却近了。

有人说：“你真傻，结婚落户后，你就一辈子离不开这穷山沟了。”郭慧明确表示：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就是我的志愿，当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就是光荣；穷山沟怕什么，正因为穷，才需要我们留下来战斗，为改变农村面貌，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更大的贡献。

就这样，郭慧冲破旧习惯势力的阻挠，顶住了错误舆论的压力，在金达莱花盛开的时节，和林昌禄结了婚。婚后，她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贫下中农称赞她是一个“挤不走、压不垮

的扎根派”。郭慧的事迹，对于前面那位写信的女青年，在怎样对待错误舆论的问题上，可说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广大劳动群众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革命的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着主导的地位，所以，那些错误的舆论常常表现为嘁嘁喳喳的是非之议。而散布这些错误舆论的，也常常是我们周围的一些熟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亲友。他们在发表错误舆论的时候，又常常出于对你的“关心”。这就容易使人受到迷惑，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错误舆论的俘虏。因此，切不要小看这些嘁嘁喳喳的舆论。当你听到这种舆论的时候，要学会用鼻子嗅一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辨别一下，这些舆论的本质是什么？它要把我们青年引到哪条路上去？

不错，舆论有压力。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会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错误的舆论同样也会给革命的人们受气受压。在错误舆论的压力面前，可以把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压垮，也可以使一个革命者锻炼得更坚强。一个革命青年，当明确了自己的前进方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决不要一听到讽刺讥笑，就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退缩不前了。也不要一听到亲友“好心的”劝导，就分不清是非，对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发生

怀疑和动摇。当你顶住错误舆论压力的时候，有些旧意识较浓厚的亲友，一时想不通，暂时断绝和你来往，那也没有什么可怕。郭慧的父母，因为郭慧在婚姻问题上不听“父母之命”，也曾一度不和她往来，郭慧并没有在父母的旧观念面前屈服，而是耐心地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所以，当父母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后，郭慧和她父母的关系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密切了，她自己也在斗争中得到了新的锻炼。

有的青年觉得，顶了错误舆论，会得罪人。对这一点，我们也要作阶级分析。首先要看得罪什么人？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革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命，岂止“得罪”这些人，而且要推翻他们的统治，镇压他们的反抗，对他们实行专政。一个革命青年，当然不能怕“得罪”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敌人。即使在人民内部，如果有的青年敢于坚持原则，在同错误思潮、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得罪”了一些人，那怕是自己的亲友，这也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所不可避免的。应该说“得罪”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这些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如果因为怕得罪人，不敢顶错误的舆论，那实际上就是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就会使自己丧失革命的锐气，迷失前进的方向，这倒是十分危险的。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要我们的思

想和行为符合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符合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无所畏惧，勇于同一切错误潮流作坚决的斗争，敢于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的决裂，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革命青春焕发光芒。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曾经遭到内外敌人种种恶毒的诽谤和攻击。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他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决心，相反，使他更坚定地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而斗争。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让我们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光辉榜样，学会阶级分析，正确对待社会舆论，讽言冷语无所惧，风吹浪打不回头，做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姓孔的不是一家人

“姓孔的不是一家人”，这是“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怒斥林彪、孔老二罪行时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上阶级对立的现实，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姓孔的不是一家人”，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天下同姓的人，都是按阶级来划分的。赵、钱、孙、李，都一分为二。同姓同族，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他们的阶级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完全冲突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共同的爱憎，所以，同姓决不能说就是“一家人”。

请看看解放前孔老二的老家，山东省曲阜县的情况吧。那时，住在县城里的孔老二的后裔，一代又一代的“衍圣公”们，倚仗着历代封建王朝、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给予的种种特权，霸占土地，收租逼债，强迫佃户无偿服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过着极端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而住在“孔府佃户

村”——曲阜县西林西村的一百四十七户“孔府”的佃户、修缮户、花匠户、守林户、打杂户、礼乐户等等，虽然也都姓孔，却受尽剥削和欺凌，过着“破屋露着天，破衣露着皮，破锅露着底”的悲惨生活。孔老二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一家只有七个人，却要三百多仆人服侍；他家办一次酒席，花的钱可供三百五十人吃一年！而贫农孔祥兰的丈夫给“孔府”挑水四十多年，压弯了腰，累成了病，最后惨死在扁担下。看，同姓一个孔字，两个阶级的对立如此鲜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西林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得好：“谁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孔府’里代代收租，咱们辈辈交租。一个孔字，两个阶级。姓孔的从来不是一家人。”

可是，长期以来，住在大地主庄园“衍圣公府”里的财主老爷们，打着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仁义道德”的旗号，散布“姓孔的是一家人”的谎言，用“宗族亲”来欺骗群众。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掩盖不了“孔府”里那些吃人肉、吸人血的豺狼真面目，他们对姓孔的佃户丝毫不讲“仁义”，同样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丰年加成收租，荒年一粒也不能少。姓孔的佃户们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

当然，“孔府”只是一个例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旧社会，有多少个象“孔府”那样挂着“宗族亲”的伪善

招牌，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劳动人民的地主老财！十分清楚，当剥削者贪得无厌地吮吸劳动人民血汗养肥自己的时候，从来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不管你是同姓外姓、同族外族，只要被剥削者身上还有一张皮、一根筋、一滴血可供压榨，剥削者是决不会松手的。俗话说，狗走千里要吃屎，狼行千里要吃人。剥削阶级也决不会因为宗族关系而改变它们反动阶级的本性。

既然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就不讲什么“宗族亲”，为什么他们又要宣扬“同姓一家人”，侈谈什么“宗族亲”呢？

大家知道，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本来就是适应剥削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在我国历史上，被孔老二吹得天花乱坠的奴隶主统治者，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建立起一种宗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的大小头目，什么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等，不但依靠反动的国家机器，镇压奴隶们的造反，而且通过宗族关系，形成一个由若干奴隶主大家族组成的严密的统治网，它们相互勾结，相互依靠，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使宗族关系更趋完备，并且形成一整套封建宗法观念，使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礼仪繁杂的封建羁绊之中。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却撕下了

笼罩在残酷剥削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封建势力却相当强大，所以，在旧中国，封建族权始终是维护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毛主席明确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在旧社会，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的封建族权，一方面是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对劳动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的手段。在一小撮地主分子所把持的宗族祠堂里，他们利用“族长”的身份，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迫使同族的劳动人民听任他们的摆布，甘受他们的盘剥。为了对付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祠堂内不但订立许多清规戒律，甚至私设刑堂。贫苦的农民，特别是妇女，往往连进祠堂的权利均被剥夺。不少农民还常常因为交不起租，还不清债，或者在“违犯族规”、“不敬长辈”的借口下，经常烧香赔礼、罚款罚跪，受到鞭打、挖眼睛，直至沉河、活埋等种种酷刑。有的时候，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又利用“宗族亲”来拉拢和收买同姓同族的一些劳动人民，施一点小恩小惠，装出一副善良的面孔，散布

“同姓一家人”的论调，从思想上腐蚀和麻痹劳动人民，骗取人们的信任，为他们卖力卖命。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宗族观念，制造宗族纠纷，挑动械斗，驱使不同姓的劳动人民为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自相残杀。总之，族权这个东西，不仅是物质上而且是精神上束缚劳动人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地主阶级制造“同姓一家人”的谎言，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观念，用“宗族亲”来掩盖两个阶级的对立，以便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地主阶级鼓吹“宗族亲”的反动实质。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欺骗和迷惑广大劳动人民，还制造和传播了不少宣扬“宗族亲”的“老古话”。

“亲连亲，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自家人总帮自家人。”事实上，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不是一家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不讲“亲”，也从来不会“帮”，当然，我们劳动人民也决不能对剥削阶级讲“亲”。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旧社会，穷苦人去投奔同姓同族的财主或有钱的亲戚，指望能得到一些帮助，到头来，却往往不但不能使自己摆脱受苦受剥削的命运，反而使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越勒越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只有在穷苦的阶级弟兄中，才能找到同

情和帮助。小说《金光大道》中高大泉一家四口从山东逃荒到河北芳草地，投奔表姐夫家谋生，可是这个发了财，正在变为富农的冯少怀看到家中来了这门穷亲戚，一下子添了四张嘴巴，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对他们的到来十分冷淡。但是，这个“生财有道”的冯少怀，转眼一算，看到这四个人都是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时，就收留了下来。从此，母子四人没日没夜地给冯少怀干活，推车放牛，缝洗织布，出尽牛马力，换来的却是剩饭冷菜以及数不尽的白眼和责骂。在那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未成年的高大泉，只有在雇农出身的乐二叔处，才找到温暖。这一老一小，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是，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伙盖一条破棉被，同喝一锅糠菜粥，他们相互照顾，相互体贴，比一家人还亲热。在老雇农的关怀下，高大泉学会了劳动的本领，更懂得了怎样对待这个吃人的旧世道，为高大泉后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亲不亲，阶级分。世界上只有阶级的仇和亲，决没有超阶级的“宗族亲”。

“胳膊总是朝里弯，是亲总有三分向”。这是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它把狭隘的家庭利益、宗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剥削阶级的所作所为都是极端自私自利、损人

利己的，因而是见不得人的。他们所以要鼓吹“胳膊朝里弯，是亲三分向”，就是为了要同族人放弃原则，不分是非，掩饰他们的剥削罪恶，维护他们一家一姓的私利。奉行这种处世哲学的，首先要推孔老二了，他恬不知耻地宣称，父亲偷了羊，儿子应当隐瞒，儿子作了坏事，父亲应当包庇，据孔老二说，这种行为是“直在其中”，无可非议的。这种逻辑，赤裸裸地暴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

十分清楚，这种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是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的阶级特性格格不入的。“胳膊总是朝里弯”吗？不对。看，旧社会常会引起宗族纠纷的水利问题，如今，龙江大队为了抢救后山九万亩良田，丢卒保车，堵江救旱，宁愿淹了自己大队三百亩高产田。龙江风格也是对“胳膊总是朝里弯”这类剥削阶级哲学最有力的批判。

无产阶级历来摒弃剥削阶级宣扬的“宗族亲”的谎言。无产阶级不承认有什么“宗族亲”，只承认有阶级亲。无产阶级讲阶级亲，出发点是为全国和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是同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胸怀最广阔，最坦白，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战士最能够无私地关怀和帮助自己

的战友和人民群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亲和阶级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阶级的仇恨，革命的风涛，把这三个异姓的工人阶级成员结成了一个钢铸铁打的革命家庭。同时，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情义，也绝不局限于这三个人的一家。请看李奶奶叫铁梅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玉米面送给邻居慧莲时的一段对话：

慧 莲 您待我们太好啦！

李奶奶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铁 梅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李奶奶 铁梅说得对！

他们两家为什么又是一家子呢？李奶奶说得好，就是因为“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把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联成了一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情义重于泰山。它同剥削阶级标榜的“宗族亲”、“同姓一家人”的伪善说教，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家王朝，也给封建族权以致命的打击。然而，封建宗族思想和封建宗族势力，是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如同一切反动思想和反动势

力一样，它也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在旧社会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绳索的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封建宗族观念，散布“同姓一家人”的谎言，用宗族关系抹杀阶级界限，用“宗族亲”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成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有的地方，阶级敌人利用婚丧娶嫁，排辈份，续家谱，妄图搅乱阶级阵线，使贫下中农忘记阶级苦，忘记血泪仇，忘记阶级斗争。有的地方，阶级敌人利用宗族之间在土地、山林、水利等问题上的矛盾，千方百计离间贫下中农的革命团结。有的地方，阶级敌人利用封建宗族关系，拉拢腐蚀农村基层干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篡夺领导权。所有这些都表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革命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警惕，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彻底揭穿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同姓一家人”这类封建宗族观念，以及“胳膊总是朝里弯，是亲总有三分向”等剥削阶级处世哲学，在人民内部，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某

些同志身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和表现。有的同志不讲路线，不讲原则，不分是非地帮“自家人”，遇到亲戚、熟人，徇私情，开后门，相互利用，相互包庇。在农村有些地方，还流行“攀过房亲”的旧习俗，它只会起模糊阶级界限，助长“四旧”活动的坏作用，而且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危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们革命青年，必须同封建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作坚决的斗争，同“宗族亲”之类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怎样正确对待家庭出身

谁都知道，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正确认识 and 对待自己的家庭出身，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可以帮助我们革命青年更好地改造世界观，更快地健康成长，争取做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许多出身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以老一辈的苦难经历和英勇奋斗的业绩，勉励自己更好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好革命的班。也有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通过揭露批判自己反动家庭的罪恶，更加仇恨万恶的剥削制度，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应该说，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可是，有少数青年在对待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背着这样或那样的“包袱”，影响着自己的进步。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和青年朋友们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讨论和分析一下这些错误认识的来源和危害，以利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我们就从“自来红”说起吧。有少数出身好的青年，沉醉于自己“出身好，响当当”，总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头上没有辫子，身上没有尾巴”，忽视自己的思想改造，背上了“自来红”的包袱。

这种想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知道，“红”，一般地说，是指一个人有较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显然，这样的觉悟和世界观，决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即使是产业工人，他头脑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也不能自发产生，而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就是说，一个工人要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必须刻苦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当然，由于工人所处的阶级地位，使他易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当他一旦掌握了革命理论以后，就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自觉地去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成长是如此，作为一个青年，怎么能够因为生长在劳动人民家庭中，就会成为一个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呢？何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无孔不入，总是伺机侵袭我们清洁的肌体；阶级敌人，也象粪坑里的蛆虫一样，

总是蠢蠢欲动，妄图把青年拉到资本主义的邪道上去。我们革命青年，如果放松警惕，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就会有变质、变修的危险。

我们说“自来红”是错误的，并不是否认家庭出身对一个青年有着重要的影响。出身好的青年，从小在家庭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这对于他的思想进步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出身好不能代替一个人的思想改造，朴素的阶级感情也不能代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句话，出身好和思想红之间不能划等号。无数阶级斗争的事实反复证明，阶级敌人决不会因为你出身好而停止对你的进攻，出身好也决不会天然地具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免疫力。世上只有“改造红”，决没有“自来红”。因此，我们出身好的青年，应当珍惜自己的有利条件，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接好革命班，永做革命人！

在正确认识家庭出身与思想改造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看到，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往往更容易陷入盲目性。

有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总是背着“老子反动，小子倒霉”、“投错娘胎，一生完结”这一类“包袱”。他们在

口头上也讲要与反动家庭和反动亲属划清界限，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缺乏决心和勇气；他们也要求进步，可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却犹豫徘徊，患得患失；他们也常会发泄一些对家庭的怨气和不满，总觉得出身不好，前途渺茫……这些青年有要求进步的一面，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必须指出，他们要求进步的动机仅仅是以个人的得失为转移的，因此，他们在行动上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事实上，出身不好的青年，要求进步绝不是个人的孤立的行动，而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与反动家庭在政治思想上真正划清界限，也不只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图个清白，而是做哪一个阶级接班人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搏斗。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争夺的对象。小说《艳阳天》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反动地主马小辫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在萧长春等人的教育下逐渐觉悟时，真是比挖了他的祖坟还要难受，还要心痛。因为他儿子、儿媳的转变，意味着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将断了根，绝了烟火，这对于一心想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反动地主来说，真可以说是窝心的一刀！这就告诉我们：在

今天,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青年,不能只停留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而应看到这种举动首先是属于无产阶级埋葬腐朽的社会制度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伟大事业;同时,与反动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实行决裂,也是这个青年阶级立场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任何一个决心同反动家庭决裂的青年,都会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如果对这样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仅仅从个人得失去考虑,就会在政治上思想上迷失方向,行动上犹豫动摇,更抵挡不住反动家长的威胁和利诱,这倒是十分危险的。

“出身不好总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无产阶级的战士我不可能当,反革命的殉葬人我也不愿做,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吧。”持有这种想法的青年,往往把明哲保身、甘居中游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一个青年既不想向无产阶级靠拢,又不想为剥削阶级卖命,企图置身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外,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这种想法,不但是十分糊涂的、有害的,而且是根本办不到的。当你看到阶级敌人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非法活动,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时候,你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当你看到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孔孟之道,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唆使青

少年犯罪的时候，你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吗？当你看到反动家长在造变天账，妄图反攻倒算的时候，你能眼开眼闭、不闻不问吗？问题很清楚，你不得罪阶级敌人，就必然得罪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哪里谈得上什么“清清白白”做人呢！其实，有些青年的所谓“清清白白”，就是想躲避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扑在搞自留地、搞家庭副业等“合法”的额外收入上，或者忙于营筑自己的安乐窝。这些青年似乎是想顶住家庭出身不好给自己进步带来的阻力，实际上却是在这种阻力面前明显地表现了自己的软弱。他们没有冲破反动家庭羁绊的决心，却企图消极地回避和掩盖反动家庭给自己身上打上的阶级烙印。因此，他们所说的不愿做“反革命的殉葬人”的决心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常常会成为“父母爱”、“骨肉情”等人性论的俘虏。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罕见的。

至于说出身不好的青年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这是没有根据的。诚然，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比起工农子弟来，这些同志的思想改造是要更长期、更艰苦一些。但是，只要决心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刻苦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他们是可以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在这里，让我

们看一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榜样吧。鲁迅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过孔孟之道的毒害，又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当他决心冲破黑暗的发闷的铁屋子而为革命放声呐喊的时候，曾遭到多大的阻力呵！他拒绝了家庭给他选择的道路——当封建社会的幕僚，也戳穿了反动文人妄图逼使他放弃革命立场的阴谋，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冒着生命危险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不断揭露反动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同时，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正由于鲁迅始终跟着时代前进，跟着无产阶级前进，终于使他摆脱了从旧社会因袭下来的重担，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切，对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正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吗！

“我早就立志背叛自己的家庭了，可是总得不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有这种看法的同志，往往把什么事都与自己的出身不好联系起来。例如，有的同志要求入团、入党，一时未获批准，就认为组织和同志们对他不信任。能不能这样认识呢？不能。因为党和团的组织对每一个要求入团入党的青

年，都要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考察的时间要更长一些，这也是正常的必要的，如果经不起这种考察，产生消极或埋怨情绪，恰恰反映了他争取入团入党的动机还不端正。又譬如，有的知识青年，因为没有抽调自己进工矿，或者没有选派自己上大学而埋怨组织和周围同志不关心他的前途，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留在农村，还是到工矿、上大学，都是革命的需要，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应该是党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应该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况招工、上大学终究还是少数，大批的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砖加瓦，前途远大得很。如果认为只有当工人、上大学才有前途，坚持乡村干革命就没有前途，不正是孔孟之道所宣扬的“耕馁学禄”剥削阶级偏见的反映吗？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好的同志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决不要患得患失，以个人的偏见看问题，更不应该悲观失望。党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为我们改造世界观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总之，不论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当以革命的要求正确对待自己的出身，在三大革命斗争

实践中，使自己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为了粉碎反动阶级的复辟希望，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青年同志们，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努力学会阶级分析

前面，我们就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作了粗浅的分析。从这些事例中使我们看到，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我们革命青年的成长和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懂得，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会过时。在社会主义时期，谁要是抛弃这种方法，谁就会在实际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会在革命征途上迷失方向，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因此，时刻牢记阶级斗争，努力学会阶级分析，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怎样才能学会阶级分析呢？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学会阶级分析的首要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进行阶级分析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南。人们分析和研究自然现象，要借助各种科学仪器。例如在显微镜下可以找到不同类别的病菌，帮助人们去战胜疾病；在化学实验中，人们也可以用电解的方法把水分解为氢和氧。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在我们周围，新旧两种社会势力，革命的新生事物和衰亡中的旧事物，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经常会同时并存着，彼此斗争着。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敌我矛盾，而且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之间又有着十分复杂的联系，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我们要在复杂的斗争中不迷航，就必须借助于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才能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本质，分清是非，辨别真伪，不被纷纭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一些革命青年：柴春泽顶住拔根风，扎根农村志不移；魏尧升不留恋大城市，毅然打起背包奔赴农村；郭慧敢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

裂，在边疆农村安家落户……就是因为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他们心明眼亮，划清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共产主义思想和私有观念之间的界限；使他们不仅在实践中敢想、敢说、敢闯，而且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些革命行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立志做缩小三大差别的铺路石子，做一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着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来解决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对我们学会阶级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立场是指一个人站在哪个阶级地位上，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根本态度。人们的立场不同，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就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会相同。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曾经谈到对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这里提到的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

农民运动的；第二、三种人，是很革命的和很进步的人，又为什么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也依然离不开一个“糟”字，而不是说“好得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所以，毛主席非常尖锐地指出，对这场伟大的农民运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每个人的言行表现出来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立场。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地主资产阶级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阶级，他们的立场是反动的，他们总是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开历史的倒车，因此，他们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往往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眼光狭隘和短浅，观察和分析问题也会带上各种偏见。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小生产者的立场、观点如不加以改造，也会和革命的进展发生抵触。在革命队伍内，有的同志所以会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甚

至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往往就是站错了立场的缘故。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代表着共产主义的未来,代表着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此,我们要真正学会阶级分析,还必须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注意联系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的世界观来一个根本的转变,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要能够正确进行阶级分析,除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外,还要注意社会调查,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阶级分析是一项严肃的细致的工作,不是马马虎虎、凭一时机灵就能够做好的。毛主席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所以,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要对社会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思想面貌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要注意从大量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周围的人说的话、做的事进行阶级分析,更要注意全面地看问题,联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联系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联系这个人的全面情况和一贯表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切忌从主观想象出发,把某些个别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夸大为大量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情况和材料则不承认或者故意回避掉。总之,只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隐藏在复杂现象后面的社会本质揭示出来,把披着五光十色漂亮词藻下面的阶级内容揭示出来。这样的分析,才能击中阶级敌人的要害,撕去他们的伪装,粉碎他们的谣言和诡辩;对革命队伍内站错了立场、说了错话的同志,才能够令人信服地指出其错误的根源和危害,帮助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学会阶级分析,不是纸上谈兵,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够学到的。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到三大革命斗争的风浪中才能学到。我们青年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旧社会黑暗苦难的日子,也缺乏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阶级,缺乏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出现资

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往往缺乏足够的警惕。正因为这样，我们一些青年同志每当遇到社会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复杂情况，就感到手足无措，头脑糊涂，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看不清方向，甚至上当受骗。要克服我们青年人缺少政治经验和
社会生活经验的弱点，就必须到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到群众斗争的大课堂里去学习，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革命青年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学会阶级分析，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让我们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勇敢地翱翔吧！